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本論文在著手於「含動物詞彙俄漢成語之對比研究」時，牽涉到許多學科，如研究成語當然脫離不了成語學；想知道為何動物詞彙常被使用在成語和成語表達的組成上，必須進入國情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跨文化交際學、社會語言學的領域；尋找俄漢雙方語言的異同，則與對比語言學息息相關。因此，在這章裡，將針對與本論文相關之各學門主要學者的理論，進行介紹與討論。其中包括：跨文化交際學 - 波特 (R.Porter)、薩莫瓦爾 (L.A.Samovar)；國情語言學 - 韋列夏金 (Е.М.Верещагин)、科斯托馬羅夫 (В.Г.Костомаров)；文化語言學 - 邵敬敏；俄語成語學 - 莫洛特科夫 (А.И.Молотков)、維諾格拉多夫 (В.В.Виноградов)、奧日苟夫 (С.И.Ожегов)；對比語言學 - 拉多 (R.Lado)；社會語言學 - 梅奇科夫斯卡雅 (Н.Б.Мечковская)、陳原等。

第一節 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

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交際中，表現的最明顯。二十世紀六十年以來，在美國、前蘇聯、中國先後出現了跨文化交際學（美國）、國情語言學（俄國）、文化語言學（中國）等新興學科，研究內容雖各有側重，¹但其研究本質基本上是相似的，皆以文化和語言之間的關係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以下就將把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文化語言學放在同一節中討論。

在語言學發展的歷史裡，語言教學家對於學習語言是否應該同時學習

¹吳國華，〈文化語義學導言〉。《語言文化研究新視角（論文集）》（吳國華主編）。軍事文出版社，1999年，頁46~47。

文化、民族等外部領域，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中世紀，學習拉丁文時，課本中完全不涉及民族文化，只有單純的文法，即單字和動詞，學語言只是一種死背文法的過程。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逐漸出現語言學習須加入民族文化之想法，當時學者指出，學習語言必須配合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以求形成完全相符的思維。假若欠缺對文化現象的注意，語言學習將趨於貧瘠，變成只是單純在消化語音、詞彙與文法。²因此，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文化的搭配是不可缺少的。

在俄漢語的交際中，所出現的誤解，常是由於「跨文化」的性質決定的，即俄漢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在進行語言交際時，由於對言語內容的理解不等值所造成的。這裡的等值理解牽涉到語言因素、文化因素與社會因素。要知道語言中的每一個實詞都記載著人們對客觀事物認知的結果，因此，各種文化、社會因素，包括不同民族的心理特點、風俗習慣、交際方式都必然影響語言的形成與發展，進而反映到語言中。所以，當交際的一方所具有的知識和概念與另一方所要表達的意念相吻合，那誤解就不會產生。³「跨文化交際學」(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就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各類交際活動中涉及有關文化的種種問題。這個嶄新的學科首先興起於美國，以霍爾(E.T.Hall)於1959年出版的《無聲的語言》為其開端。此後，人類學家、社會語言學家、語言學家、外語教學家等紛紛自不同角度切入、剖析、討論及研究。波特(R.Porter)和薩莫瓦爾(L.A.Samovar)並提出三個影響跨文化交際的因素：(1)觀察事物的過程，其中包括信念、價值觀念、態度、世界觀及社會組織；(2)語言過程，其中包括語言及思維模式；(3)非語言過程，其中包括非語言行為、時間觀念及空間的使用。⁴

七十年代，蘇聯也開始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係。與西方不同的是，他

²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М., 1990, с.9~37.

³趙愛國，〈試論俄漢語言交際中的文化誤點及誤因〉。《西北大學學報》，1997年2月，第2期第27卷，頁101~105。

⁴威雨村，〈語言對比和文化對比〉。《對比語言學論文集》(王福祥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2年5月，頁341~343。

們側重於語言單位的文化內涵之研究，「國情語言學」(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這一學科因此出現。它是在對外國人進行俄語教學的基礎上形成的，目的是向學習者介紹所學語言的文化情況。其奠基性的著作為1973年韋列夏金(Е.М.Верещагин)和科斯托馬羅夫(В.Г.Костомаров)所發表的《語言與文化 - 作為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國情語言學》(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⁵國情語言學是一門透過文化功能來研究語言的學科。因為外語的學習與教學都是一種文化移入的過程，國情語言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讓學習者對所學語言的民族文化產生正確的認識。所以，當學習外語，尤其是詞彙與成語方面，在母語中找不到完全相符的解釋時，必須藉助國情語言學這個方法，以促進語義的正確了解；同時，國情語言學的研究也必須透過語言來彰顯，兩者可說是相輔相成，也因此在本論文中，不可忽略此項理論。

八十年代中期，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深刻的語言學發展之推動下，中國開始流行起「文化語言學」，又稱「語言文化學」，它也是一門把語言和文化結合起來研究所形成的學科。它的產生可分外在、內在兩因素：外因是受到國際上及國內其他學術界「文化熱」的影響，試圖溝通語言與文化的內在聯繫，進而重新確定語言本身的文化價值；從內因看，若干年前漢語學界極偏重形式研究，只熱衷於結構主義語言學，因此，文化語言學的崛起是對這種現象的一種反思，企圖擺脫舊理論模式的束縛，想在文化、社會、心理等方面獲得深層的詮釋。文化語言學是文化學與語言學的交叉科目，既可從文化到語言，也可從語言到文化進行雙向研究，相互驗證，分別補其研究之不足。⁶它將語言置於一個更大的社會人文背景中去觀察，從考古、人文地理、社會歷史、語言形式等多方面去研究，完整地勾畫出一個多彩而豐滿的語言世界。⁷

⁵同上註，頁343~346。

⁶邵敬敏主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頁81~83。

⁷周慶華，《語言文化學》，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4月，頁156。

經過上幾段的證明，可得知不論是歐美的跨文化交際學，或是俄國的國情學，還是中國的文化語言學，都在強調外語的學習必須與民族國情(包括該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等等)的了解同步進行，這些方面的知識就是文化背景知識，是一種廣義的語言環境。缺乏這些知識的學習者，往往會用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來「移植」或代替，這大大降低了外語的交際能力。

究竟語言負載何種功能，為何它和文化有如此深厚的關係？由於筆者為俄語專業的學習者，因此，將以俄國學者韋列夏金(Е.М.Верещагин)和科斯托馬羅夫(В.Г.Костомаров)的著作《語言與文化 - 作為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國情語言學》(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此書可說是研究國情語言學的始祖之一，內容詳述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的關係，提出國情語言學之研究方法、研究客體，並列舉含有動物詞彙的成語作為例子，提供給本論題極大的幫助。書中自國情語言學的角度，歸納出語言社會性的三大功能：

1 . 交際功能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語言是一種傳遞訊息的工具，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方式，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相互了解。無誤的交際取決於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方的腦中有著相同的背景知識。如果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不適度地使用一個國家的國情資訊，那麼不管在口頭或書面上，都無法達到充分的交際作用。

2 . 積累功能 (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語言不僅有傳遞訊息的功能，還具有反映、紀錄及保存人類發展進步資訊的功能。從一方面說，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承載著全民族共同的記憶與思想，保存了世界上所產生的訊息與知識；另一方面，語言是「個體」的所有物，是包羅萬象的生活經驗之保存者。因為每個人接受外部訊息與教育，而累積成自己獨特的語言系統。

3 . 指示功能 (дирек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語言是人類思想的物化基礎，整個人類認知活動的發展過程和語言思維的形成有關。此外，語言對於個人的性格與思維的建立，也具有指引的作用。

以上三個功能對於語言的研究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在此我們要特別提出「積累功能」來討論，因為此功能可說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片鏡子，要知道，語言是直接與思維聯繫的，它把人思維活動的結果，用詞及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得人類社會中的思想交流成為可能了。在語言系統中，「積累」的部分就是語義分子的總合，這些語義分子反映出各種自然的情感、評價和相互關係，藉助心理學術語 - 「聯想」(ассоциация)來表現，而語言單位的自然情緒聯想之總合，即稱為「內涵意義」(коннотация)。內涵意義充分地體現於詞彙方面，而它具聯想性的特性，更與民族傳統的文化思想相互契合，且賦予深厚的文化含義。⁸所以，這些帶有文化色彩的內涵意義，則成為我們研究的重點之一，將於第三章深入探討。

語言系統本身就是一個文化世界，就是民族文化的載體。語言既然和文化現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為了實現跨文化交際，須努力消除「他人的」(чужой)語言，也就是「第二」(вторичный)語言(母語為第一語言)的障礙。所以，學習外語的任務之一是能夠滲入第二語言(即所學之外語)之精神和其民族文化，體現其內部聯想與轉喻的使用，使所學之外語如同「自己的母語」，以便真正地了解與掌握。⁹

第二節 成語學

有人說：成語把世界民族的面貌付梓於語言中。語言反映民族文化，

⁸見註 2, с.9~16.

⁹Гудков Д. Б.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М., 2000, с.35~37.

倘若把語言視為交際場上的演員，那成語就是演員中的主角，因為每一個成語的背後，都存在著一個故事，其內涵意義更能表現出民族文化的特色。

壹、俄語成語

俄語中，成語學（фразеология）這一術語源於希臘語 phrasis（短語）和 logos（學說）。俄語成語是一種獨立的、稱名的、語言的單位，是一個固定的詞組，在語言中起著詞的作用，在句子中發揮句法功能，成為一個句子成分。接著就根據其結合程度、來源和特徵，逐一進行討論。

何謂成語？維諾格拉多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在一九五三年〈論俄語成語的基本類型〉（Об основных типах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一文中，將成語依其結合程度，分為三類：¹⁰

- 1．溶合性成語（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ращение）：成語中的各詞已完全溶合為一體，整個成語的意義和組成該成語的各詞的意義毫無關係，從而構成不可切分的固定詞組。也就是說，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詞彙上也不能變更。例如：собаку съесть（內行，有經驗）；козёл отпущения（代罪羔羊）。
- 2．接合性成語（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единство）：成語中的各詞保留程度不等的獨立性，整個成語的意義不等於各詞意義的總合，而是由各詞意義推導出來的，從而構成統一的不可分解的固定詞組。其整個詞組的組成是現代俄語所能理解的。其解構不似溶合性成語那般穩定，可增添個別的詞，詞序也可作小移動。例如：глядеть ягненком（貌似羔羊，引申一副老實相）；стреляный воробей（被射擊過的麻雀，引申老手、經驗豐富之人）；белая ворона（白烏鴉，引申與眾不同之人）。
- 3．組合性成語（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четание）：此類成語是一些不自由的、在搭配上有限性的詞之結合，各個組成部分雖不自由，但其中有軸心詞和以軸心詞為轉移的可變部分，可變部分可用同義詞替換。相較

¹⁰丁昕，〈俄語成語研究〉。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1年3月，頁1~16。

於前兩類，組合性成語中的各詞有比較大的獨立性，只有一個詞用於非自由意義，用於非自由意義的詞和其他詞的搭配範圍有嚴格的限制，從而構成非自由詞組。例如：братъ (берёт) 只能和下列有限的詞連用，тоска (思念)、зависть (忌妒)、грусть (憂愁)、страх (害怕) 等。

除了上述三類外，蘇聯學者尚斯基(Н.М.Шанский)還多分出一種「聯合性成語」(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¹¹這類成語如果與組合性成語相比，其意義結合的緊密程度更小，整個成語的整體意義即等於各組成部分意義之總合，且此類成語分為兩種形式，一是詞組，例如：слепая кишка (盲腸)；一是句子，包括名言、諺語、俗語等，例如：волков бояться - в лес не ходит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等。¹²名言是出於作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等之口的機警而有意義的話。諺語是民間流傳的簡短有力的話語，通常是詩歌形式，有形象的敘述和道德告誡。俗語也是一種民間創作，和諺語的區別為它只有形象敘述，而不說出道德告誡。在蘇聯的語言界不少學者支持尚斯基，認為成語還包括名言(крылатые слова)、諺語(пословицы)、俗語(поговорки)，如布拉霍夫斯基(Л.А.Булаховский)和列福爾馬茨基(А.И.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分別在其所著《語言學概論中》(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都把諺語、俗語歸作成語的一個類別。但也有不少學者持相反的意見，如莫洛特科夫(А.И.Молотков)在其編輯的《俄語成語字典》(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前言中就提到諺語、俗語、名言等皆不屬於成語。奧日苟夫(С.И.Ожегов)也曾說：「諺語和俗語超出了成語本身的範圍，和『名言』類似，不是語言體系的要素。它們具有句子的完整句法結構」。由於各派學說分歧，為了讓討論的焦點集中，本論文採取受到大多數學者所接受的維諾格拉多夫之理論，把俄語的名言、諺語、俗語歸入「成句」，¹³不列入本文「成語」的討論範圍。不

¹¹ Шанский Н. М.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72, с.203~204.

¹² 王德孝等編，《現代俄語理論教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頁553~560。

¹³ 黃弗同、劉文娟，《成句初議 - 俄語的諺語、俗語和成語》。華中師院學報，1981年2月，頁125~130。

過，在探討的過程中，將由俄語的角度出發，若進行俄漢對比時，漢語出現對應的諺語、俗語等，則將不受此限制。

至於，成語的來源不一，大致可分八類，以下各舉一例說明：¹⁴

1. 民間口語，如：встать с левой ноги (情緒不佳) 的由來為，古代俄羅斯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迷信所謂的「徵兆」，他們認為早晨下床時，如左腳先落地就會整日不順利。
2. 古代神話，如：на волоске (千鈞一髮) 出於希臘傳說。
3. 聖經，如：волк в овечьей шкуре (披著羊皮的狼) 語載《馬太福音》第7章第15節。
4. 歷史事件，如：на лбу написано (一望而知) 源於沙皇時代的一種刑罰。
5. 職業用語，如：играть первую скрипку (首席，第一把交椅) 來自音樂用語。
6. 文學作品，如：как белка в колесе (像松鼠蹬輪子似的，引申徒勞無功) 來自於克雷洛夫 (И.А.Крылов 1769~1844) 的《松鼠》(Белка)。
7. 仿造外語，如：делать из мухи слона (小題大作) 仿自法語。

俄語在成語的特性上，學者們的界定各不相同，大致歸納如下：¹⁵

- * 意義的不可分割性和完整性：成語是一種意思完整詞組，其含義不等於所組成各詞的意義總合，不能逐字理解，是一個詞彙單位。如：собачий холод (嚴寒) 的意義不等於 собачий (狗的) 的意義加上 холод (寒冷) 的意義。
- * 形式的定型性：成語在其組成上有固定的搭配，不可任意抽離、加添或更換其內容。如：глухая тетеря (聾如黑琴鳥，指聽力不好的人) 就不可換成 глухий воробей (聾如麻雀)。

¹⁴彭在義，《俄語成語釋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5月，頁4~7。

¹⁵Шмелёв Д. Н.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 1997, с.289~318; Молотков А.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67, с.7~23.

- * 結構的開放性：某個詞組被歸入成語的範圍時，並不是由於其結構符合某一個標準。一般來說，成語的結構是沒有嚴格的限制的。
- * 語義的同義性：成語以其特別的修辭功能來豐富語言，不過每一個成語都可找到與其意義相同的詞或詞組。成語的同義不取決於個別成分的同義，也許詞或詞組的結構組成不同，依然能構成同義的關係。
- * 明顯的民族性：成語之所以能以有限的詞表達豐富的內容，是因為每一個成語幾乎都是一個小故事，凝結在固定的詞組或短語中，構成一個特定內涵意義，表達出特殊的語義色彩。
- * 使用的侷限性：成語帶有豐富的表情色彩，因此大量被使用於文藝作品、政論中，以及日常生活裡；反之，在純事務性的語體中則很少使用。

俄語成語富有十分生動的形象，在語言交際中起著很特別的作用，假若能夠道地活用，不但可達到交往的目的，更將豐富自己的言語的意涵。

貳、漢語成語

漢語成語是人們長期沿用、結構穩定、形式簡潔、意義完整的定型短語。由於大都繼承自古代書面語，沿用已久，約定俗成，所以稱為「成語」。它是漢語詞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結構上雖然只是一個詞組，卻被做為一個完整單位來使用，相當於一個詞，可充當句子裡的某個部分。從成語的結構上看，以「四字格」為其形式特點的成語佔多數，四個有意義的語素的組合，可以濃縮一個故事，可以講明一個哲理，運用成語得當，使得表達豐富而簡練，且具有各種修辭色彩。這作用是一般雙音合成詞所達不到的。¹⁶

在漢語中，成語的定義較俄語明白，雖然它和俗語、諺語、歇後語、慣用語、引語、格言皆屬於「熟語」¹⁷的範圍，但彼此清楚地被區分。俗

¹⁶賴慶雄，〈認識字詞語〉。台北：國語日報出版，1989年，頁221~222。

¹⁷熟語是指語言中固定的短語或短句，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組成，但由於詞之間的結合關係緊密，因而它也同詞一般不可分割。

（參自王寧、鄒曉麗，〈詞匯〉。香港：海峰出版社，1998年，頁171~172；崔希亮，〈漢語熟語與中國人文世界〉。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頁1~2。）

語和諺語是在民間口語中廣泛流傳的、含有道理的現成話，從結構上看，俗語為單體結構（例：掛羊頭賣狗肉），諺語大部分為雙體結構（例：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兩者皆為固定語句；歇後語是熟語中較特殊的一項，主要表現在它獨特的結構，可分有歇面、歇底兩部分（例：打開天窗 - 說亮話）；慣用語同成語一樣可當詞看待，多為「三字格」，其形象生動，有鮮明的口語色彩（例：夜貓子）。

漢語成語來源十分複雜，主要有下列幾種途徑：¹⁸

1. 民間口語：「一口咬定」、「沒精打采」。
2. 神話傳說：「夸父追日」的由來見於《山海經 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
3. 聖經、佛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基督教《舊約全書 申命記》中的話。「曇花一現」出自於《妙法蓮花經 方便品第二》：「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
4. 歷史故事：「指鹿為馬」來自《史記 秦始皇本紀》，描寫當時秦丞相趙高為篡奪政權而想出的計謀。
5. 詩文名句：「水落石出」源於宋代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6. 寓言故事：「守株待兔」語載《韓非子 五蠹》。
7. 仿自外語：「象牙之塔」引自十九世紀法國文藝批評家聖佩韋批評同時代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維尼的話。

想要無誤使用漢語成語，首先必須先了解其特色，才能正確地掌握它，概括有以下幾點¹⁹：

* 意義的整體性：一個成語表示一個完整的意義，一般具有特定的含義，不可望文生義。如：「對牛彈琴」為“對愚人說深理”之義，切勿根據

¹⁸參見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2月，頁222~227；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頁121~126。

¹⁹王寧、鄒曉麗，《詞匯》。香港：海峰出版社，1998年，頁172~176。

其字面意思，以為是彈琴給牛聽。

- * 形式的定型性：成語由固定的詞語構成，不可隨意替換，如：「風聲鶴唳」不能換成「風聲鳥唳」或「雨聲鶴唳」。
- * 結構的固定性：漢語成語在結構上有固定形式，大部分皆符合「四字格」²⁰的條件，如：「狐假虎威」、「如虎添翼」。
- * 歷史的傳承性：漢語成語大多數是長期為人們廣泛使用的，從時間上看，不少成語來自先秦古籍，已用了幾千年，如：「蟻穴潰堤」、「老馬識途」皆出自《韓非子》。
- * 使用的限制性：成語在語言中有特定語言形式，在使用上受到語體、文體、場合、社會階級的限制。多用於書面語體等政論性的文章，通常以知識份子的使用頻率最高。

如說成語是漢語的瑰寶，一點也不為過，在漢語中，成語佔有很大的數量，成語不僅從數量上，也從詞的表現力上大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若能因文制宜地活用成語，將可提升漢語水平。

參、成語的意義及價值

綜觀俄漢語，可說成語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交際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因此，研究成語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丁昕就在《俄語成語研究》一書中，由四種不同的角度，來證明成語的意義與價值：²¹

- 1．從語言學角度：成語是介於詞、詞組和句子之間的一種語言單位，它有結合的固定性、意義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使用的侷限性等特點，在人們的交際過程中，作為一個整體的單位加以運用。因此，成語學的研究為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方法。
- 2．從文化學角度：成語反映著一個民族的民族習慣、歷史發展、價值觀念以及該民族對客觀世界的看法，可以說，成語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鏡

²⁰崔西亮在其著作《漢語熟語與中國人文世界》中指出：「對《分類實用成語詞典》（高光列 1987）進行統計，該詞典共收詞條 3200 條，其中四字格形式的 3150 條，約佔總數的 98.4%，其餘的條目有許多可以看作是其他的熟語形式。」

²¹見註 10，頁 27~29。

子，能夠反映出說這種語言的民族之文化觀念和世界圖景。在全球越來越重視「跨文化交際」的同時，成語的研究也隨之有著越來越重要的現實意義。

- 3．從言語交際活動角度：成語的價值和意義之最終實現是在人們的日常交際過程中。成語以其意義簡潔、結構嚴謹、形象生動等特點在人們的交際過程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與功能。如能巧妙、正確地掌握成語，是進行成功交際的一條事半功倍的途徑。
- 4．從外語教學的角度：由於成語背後的意涵，常無法直接通過字面了解，成為外語學習者的障礙，所以，有必要在這方面多花心思，加以指導，使學習者全方位地了解成語的內部意義及其使用場合，才能正確掌握成語。

肆、俄漢成語之異同

本論文既然以俄、漢含動物詞彙的成語為比較對象，就必須先了解俄、漢成語在定義、來源及特性各方面的異與同，找出可能阻礙對比過程中的因素，定出適當的比較基準，以提高比較結果的正確性。大致歸納如下：

- 1．在定義方面：俄、漢成語的定義界線並不完全相同，縱使兩者皆為人們長期沿用的定型詞組，在語言中起著詞的作用，在句子中發揮句法功能，但俄語成語的範圍較大，只以結合程度作為要求，也就是一種固定（устойчивое）不自由（несвободное）的詞組，而漢語成語則有較嚴格的限制，多為固定字數，假若以漢語的成語定義為準，在比較上將有困難，因此，本文以俄語成語的定義為基準，進行比較。
- 2．在來源方面：俄、漢成語的產生過程大致相同，不外是民間口語流傳下來的，或是源出歷史故事、文獻和文學作品，另外，就是模仿、翻譯外來語。其實，並不難看出在俄、漢成語來源上如此相近的原因，成語既然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晶，而文化包含了民族的歷史過程、日常生活等大大小小的事，所以，成語的產生自然離不開言語與各種文獻了。
- 3．在特性方面：俄、漢成語在意義的不可分割性和完整性、形式的定型

性、歷史傳承性、使用侷限性、語義的同義性等方面大致相同，須特別說明的是，雖然，兩者在使用上都受到限制，但仍有些許的不同之處：俄語成語除了在純事務性的語體中很少使用之外，大量被使用於文藝作品、政論中，甚至在日常生活裡，一般的市井小民也朗朗上口；漢語成語則多用於書面語體等政論性的文章，通常以知識份子的使用頻率最高。不過，倘若以俄語成語的定義來看漢語成語，兩者在使用上就幾乎沒有差別了。另外，在結構上，兩者則完全不同，相較於漢語成語「四字格」的條件，俄語成語的結構就沒有嚴格的限制，且在使用上可依句子的需要，作詞序的變動，有較自由的表現。

成語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它是文化的濃縮及結晶，體現了民族的智慧、歷史、社會、文化、世界觀及人類發展的成果，這也是本文之所以選擇它來作為研究的原因之一。必須預先說明，在本論文三、四章中，我們將由俄語成語為出發點和漢語成語進行比較，為了便於對比研究的進行，第一，將以俄語成語的定義為主，漢語成語不受四字格的嚴格限制；第二，特別把俄語的名言、諺語、俗語排除在探討的範圍之外，假如在比較中，漢語出現對應的慣用語、諺語、俗語等，則將不受此限制。經過此節之分析，對於俄漢成語的定義、特色及意義價值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這將有助於往後的分析及討論。

第三節 對比語言學

對比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語言科目，但它的前身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初興起於歐洲的語言研究方法 - 歷史比較法。歷史比較語言學（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形成於十九世紀，一百多年來，已經廣泛運用於世界各個不同語系的諸語言及方言，作為一種研究其歷史狀況及親緣關係的理論與方法。然而，歷史比較語言學所作的比較，

只限於有親緣關係的語言歷史狀況，很少涉及非親屬語言（如漢語與俄語等）的現狀異同。鑒於當今非本族語教學與翻譯發展的迫切需要，共時性的語言比較研究逐漸盛行於世界各地，且發展成一門新興學科。在傳統語言學中，「比較語言學」（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指的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為了區分前後兩種比較法，而將新學科稱為「對比語言學」（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²²

相較於歷史比較語言學，對比語言學大大地擴展研究對象，其主要研究任務為通過不同語言的共時對比，分析探尋可用於非本族語教學和翻譯的規律性知識，並為語言科學的綜合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方法、論據和例證。卡科（В.Г.Гак）說：「對語言進行對比研究，目的在於揭示各種語言（不論是否為親屬語言）之間的異同。」²³在進行兩種語言的對比分析時，可依其研究的對象及內容來區分，研究語音的為對比語音學，研究語法的為對比語法學，研究詞彙的為對比詞彙學，而研究成語的則為對比成語學。

24

依據對比語言學的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時，可分單向和雙向。所謂單向對比指的是，以語言 A 出發，研究語言 A 的某種範疇、形式、意義在語言 B 中如何表達，有何等值物。這兩種語言的關係為：語言 A 為出發語（исходный язык），語言 B 為對象語（язык-цель），由語言 A 到語言 B。雙向對比，即以某種範疇為基點，兩種語言的平行對比，其中並無出發語和對象語之分。²⁵俄國學者柯里莫夫（Г.А.Климов）認為：「對比研究一般是分析兩種語言的結構，旨在探索教授其中一種語言的最理想的方法。」²⁶外語教學過程中所使用的對比一般是單向對比，因為其目的是讓學習者學

²²王福祥，〈一門新興的語言學分科 - 對比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論文集》（王福祥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2年5月，頁1~3。

²³Гак В. Г.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ов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ти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1974, №3.

²⁴見註22，頁3。

²⁵張會森，〈對比語言學問題〉。《對比語言學論文集》（王福祥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2年5月，頁24。

²⁶Климов Г. А.，〈語言的發展學、類型學和地域學會類法的相互關係〉。《國外語言學》，1982年第4期。

會母語以外的語言，因此，相較於外語，此時母語扮演的較次要的角色。

對比研究以共時對比的範疇為基礎時，除了上述的單、雙向原則，還有兩種基本做法：「從形式到內容」和「從內容到形式」。「從內容到形式」是指對比的範疇具有語義性，為語義範疇或功能語義範疇，目的是以一個語義群為基礎，對比其內部關係和表達手段；「形式到內容」則指對比的範疇具有形式性，概括著一定的形式手段，簡單來說，即藉著語言的外在表現，來探索語言的內在文化。²⁷

早期的對比語言學著重於「差異」，然後漸漸發展到同時注意兩種語言的「異同」，而近年來，一種令人矚目的傾向更浮出檯面，開始由單純地比較兩種語言的結構，走向比較兩種語言的「文化」。在拉多（R.Lado）的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跨文化的語言學》一書中列出，文化對比可透過形式（form）、意義（meaning）和分布（distribution）三個層次的關係來進行。形式指的是語言本身的形象，意義為語言所內涵的文化意涵，而分布則是語言存在的時間與空間，也就是其歷時性或共時性之原則，以及其語體特徵。其三者關係可分為：（1）同一形式，不同意義；（2）同一意義，不同形式；（3）同一形式，同一意義，不同分布。²⁸在三者並無法孤立存在的條件下，語言因文化而異的這一課題，已普遍地受到人們的欽賴。

另外，有些蘇聯學者更明白指出，「對比語言學是翻譯理論的直接理論基礎」，或者「對比語言學是翻譯理論及實踐的語言學基礎」。²⁹因此，如要使研究的結論更具實用性和科學價值，不應停留在少數對應成語的羅列和分別說明上，而應當在大量譯例的對比分析基礎上，概括地揭示俄漢成語的共性和特性。由於俄、漢語的成長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並無法逐字逐句地照翻，而必須與原語言文化的條件配合。

烏申斯基（К.Д.Ушинский）曾說：「比較是一切認識和思維的基礎。」

²⁷見註 25，頁 24~28。

²⁸見註 4，頁 342。

²⁹見註 22，頁 7。

我們通過比較來認知世界上的事物。」³⁰比較方法是認識事物的基本方法，本論文就藉著成語對比，使俄語的特色通過漢語的比較更清楚地、更深刻地被認識。在對比方法上，本論文將不侷限於一種對比，而將採用單、雙向交叉並用：第三章探討含動物詞彙之成語，在俄漢語兩者間的文化意涵時，為了說明同一種動物在不同文化裡的含義，將採雙向對比的使用，且「從內容到形式」，以同一種動物為基準點，探索其在俄、漢語中的文化內涵（內容），再分析牠們如何體現於俄、漢成語（形式）；第四章有關俄漢含動物詞彙成語之形象、意義及翻譯，由於筆者為俄語研究者，將以俄語為主，漢語為輔，進行單向對比，並「從形式到內容」，即從動物詞彙（形式）進入俄、漢成語後，形象使用之異同，產生意義上（內容）的變化，觀察其作用在不同語言中所產生的不同語言形式，進而為俄語成語求其適當的漢語翻譯。在比較過程中，也將採拉多所提出的「形式 - 意義 - 分布」三方對比，不過，由於本論文主要在探討語言與文化的關係，而一但牽涉到文化，就必須跨越時間的藩籬，才能進行比較。所以，本論文只涉及「形式 - 意義」的比較，無法同時顧及「分布」所提及的修辭、使用習慣、語言環境之原則。

第四節 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социа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由傳統普通語言學或描寫語言學分化出的獨立學科，對於當時追求純形式研究的語言學是一個重大的革新。它的宗旨是在語言的社會環境中，以共時為原則，研究語言運用的規則和演變，試圖建立能夠解釋這些規則和演變的語言學理論（例如：紐約百貨公司中 r 音的社會分層、黑人英文的語法特點等），³¹可說是一門關係到語言學、社會學、人

³⁰Ушинский К. Д. «Избранные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79, т.3, с.436.

³¹見註 6，頁 12~13。

類學、心理學、信息論等領域的多科性交叉科學。其發展背景為³²：(1) 二次大戰後，因社會經濟有了巨大的飛躍變化，引起社會生活一系列重大革新。(2) 科學技術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電子科學的驚人發展，使信息交換起了跨時代的改變。(3) 第三世界的各發展中國家在此時擺脫了被奴役的束縛，取得獨立自主的權利，因而出現民族語、公用語、標準語或其他語言認知與使用上的問題。(4) 包括政府（官方）和非政府（非官方）的國際組織間交往日益頻繁。(5) 國家（政權）逐漸重視語言問題，而開始進行「干預」，例如：語言政策、文字改革、語言規劃等等。

社會語言學就是在這個歷史時代裡，為了因應社會交際的需要，以及解決社會生活中有關語言的迫切問題而興起的。有關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各派學者紛有不同之見解，英國學者楚吉爾（P.Trudgill）就定出階級、民族、種族（集團）、性別、地域、語境這些類別。然而，某些學者則認為還可增補如文化層、經濟層等項目³³，如俄國學者梅奇科夫斯卡雅（Н.Б.Мечковская）就在其著作《社會語言學》（Социа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中說明社會語言學的任務之一，為探索語言與文化之間的相應關係：「在每一種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著總體性和民族性；在每一種語言的語義中，也反映著包羅萬象的文化成分與其民族文化之獨特性。現代語言學須傾向於『語言與文化』這一課題的探求，致力於走離單一方向的決定論，換句話說，不應草率決定語言和文化何為第一，何為第二。」³⁴中國學者陳原也指出：「一種被特定社會公眾使用的語言，與這個特定社會的模式和文化結構，總是息息相關的。在一般情況下，語言同社會文化結構、文化傳統是相適應的；甚至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有哪樣的文化，就會產生哪樣的語言。如果語言和文化兩者相不適應，那麼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就會迫使語言的某些方面（語言結構的某些要素）調整到能夠適應的程度。」³⁵這兩位中西學者一致認為，社會語言學亦牽涉到文化的概念範圍。

³²陳原，《語言與語言學論叢》。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2月，頁1~20。

³³同上註，頁27。

³⁴Мечковская Н. Б. «Социа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М.,1994, с.66.

³⁵見註32，頁21~25。

語言負擔著頭等重要的和極其繁複的社會職能，如果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無法繼續發展，甚至無法繼續存在。社會模式與文化結構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社會、文化、語言三者皆無法單獨存在，因此，本論文特立此節來稍作解釋。不過，在文化語言學中，已經討論了文化與語言之關係的重要性，便不再詳細敘述。

經過以上對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文化語言學、成語學、對比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的討論後，在此為本章做一總結：

1.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在學習外語方面，須加入民族文化之研究，已成不可避免的趨勢。
2. 跨文化交際學（美國）、國情語言學（俄國）、文化語言學（中國）等新興學科，皆是討論文化和語言之間的關係。因本論文作者為俄語學習者，將採國情語言學的觀點。
3. 語言具有交際、積累、指示三功能，與本文都有密切的關係，但在討論的過程中，重點為積累功能。
4. 成語是民族語言財富的一部分，在成語中，積累著豐富的文化意涵，而這文化意涵即國情語言學所指的「內涵意義」(коннотация)。因此，研究成語需要具備歷史、生活風俗、民族文化、藝術、文學等背景知識之基礎。
5. 不論俄漢成語都有以下特色：意義的整體性、形式的定型性、明顯的民族性、歷史的傳承性、使用的侷限性。
6. 俄漢成語大致有相同的產生歷程，大都來自民間口語、歷史故事、歷史文獻、文學作品，以及翻譯自外來語，且都是中俄民族文化的結晶。
7. 俄漢成語定義不完全相同，漢語較俄語狹窄（例如：漢語成語有大多有四字格的限制）。
8. 近年來，對比語言學的發展已由純粹比較兩種語言的研究，走向比較

兩種文化。

- 9 . 對比語言學有利於外語教學與學習，是翻譯理論及實踐的直接基礎。
- 1 0 . 社會語言學是整合性的學科，包括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信息論等，試圖建立語言運用規則及演變理論，不過對於其研究範疇各家意見不一，例如有的學者將「文化」列入，有的則不。

本論文根據以上各學科，但有些研究方法必須做調整。補充說明如下：

- 1 . 成語定義：在俄語成語定義方面，本文採俄語主流意見 - 維諾格拉多夫之觀點，即成語為固定的（устойчивое）不自由的（несвободное）詞組（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為了便於對比研究的進行，特別把俄語的名言、諺語、俗語排除在探討的範圍之外。另外，由於俄漢成語定義不同，對於漢語成語的定義，本論文將採俄語成語的觀點，也就是說，漢語中固定的、不自由的詞組，皆視為成語，而不受本身「四字格」的限制。
- 2 . 單雙向對比：在比較方法上，本論文將不侷限於一種對比，而採用單、雙向交叉並用：第三章探討含動物詞彙之俄漢成語的文化意涵，為了說明同一種動物在不同文化裡的含義，將使用雙向對比。第四章有關俄漢含動物詞彙成語之形象、意義與翻譯，由於筆者為俄語研究者，將以俄語為主，漢語為輔，進行單向對比。
- 3 . 內容 - 形式：第三章「從動物詞彙所代表之文化意涵談起」，「從內容到形式」，即「從文化到語言」，以同一種動物為基準點，探索其在俄、漢語中的文化內涵（內容），再分析牠們如何體現於俄、漢成語（形式）。第四章「俄漢含動物詞彙成語的形象與意義之異同及翻譯」，「從形式到內容」，即「從語言到文化」，從動物詞彙（形式）進入俄、漢成語後，形象使用之異同，產生意義上（內容）的變化，觀察其作用在不同語言中所產生的不同語言形式，進而為俄語成語求其適當的漢語翻譯。

4 . 形式 - 意義 - 分布：在比較過程中，將以拉多所提出的「形式 - 意義 - 分布」對比為基礎。不過，由於本論文主要在探討語言與文化的關係，而一但牽涉到文化，就必須跨越時間的藩籬，才能進行比較。所以，本論文只涉及「形式 - 意義」的比較，無法同時顧及「分布」所提及的修辭、使用習慣、語言環境之原則。加上這些因素的涵蓋層面過大，宜另作一文詳細敘述，作為他日研究之主題，本論文暫不涉及。